



辅导材料
内部参考

《水浒》是一部 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广西大学中文系大批判组

一九七五年十月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
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
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
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
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鲁 迅 论 《水 浒》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
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
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
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
第四卷第一百二十三页）

目 录

前 言.....	(1)
一、《 水 浒 》是怎样出笼的.....	(2)
二、《 水 浒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8)
三、宋江上梁山，混进农民革命队伍.....	(15)
四、宋江篡夺梁山领导权，搞修正主义.....	(21)
五、宋江出卖革命，向朝廷投降.....	(28)
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35)
七、宋江的下场.....	(40)
八、驳所谓“农民的局限性”	(43)

前 言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

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这部小说在我国影响很大，流毒甚广。长期以来不少文章美化和歌颂《水浒》所肯定的投降主义路线，甚至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是必须加以澄清的。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这一场斗争。

一、《水浒》是怎样出笼的

《水浒》是以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古典小说。

《水浒》的故事从流传到成书，都与当时的阶级斗争有关，不同的阶级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倾向。长篇小说《水浒》的出笼，则完全适应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政治需要。

《水浒》的故事起源于北宋末年。南宋以来成了社会上流行的传说。在民间说唱文学中，主要传诵鲁智深、武松等人的故事，如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一书记载的当时说书的题目中就有“花和尚”、“武行者”等。在一些地主阶级文人的笔下，主要颂扬宋江，并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逐渐掺入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思想。南宋末年画家兼作家龚开（圣与）所作的《宋江三十六人赞》，有图像，有赞词，第一次完整地记录了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他在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而他自己则竭力吹捧宋江“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意思是不反皇帝，能够遵循封建秩序），是“盗贼”中“出类而拔萃”的人物。宋末元初出现了《大宋宣和遗事》一书，记述了“梁山泊聚义本末”，其中写杨志卖刀、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三个故事比较完整，末尾写到宋江受招安和“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已勾勒了《水浒》

的初步轮廓。

在元代，《水浒》故事被搬上了舞台，出现了一批水游戏。现存剧目有二十多种，剧本保留下来的只有五、六个。这些戏的主角大多是李逵，其次是武松、燕青等，宋江在剧中都是作为配角出场的。戏里提到的梁山泊规模已由三十六人增至“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可见《水浒》故事这个时期在民间传说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到了元末明初，相传由施耐庵和罗贯中把流传的《水浒》故事加以搜集，重新加工改写，完成了长篇小说《水浒传》。《水浒》成书距离现在已有六百多年。

关于施耐庵，没有什么可靠的历史记载，传说他参加过元末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罗贯中大约生活在公元1330年至1400年之间。据记载，他也与张士诚有过关系。张士诚原是元末一支农民起义的首领，后来为元统治者所收买，接受了元朝的官号，转而与坚持农民革命的红巾军为敌。《水浒》的两个作者相传都与贩卖农民革命的张士诚有过关系，看来他们歌颂叛徒宋江，宣扬投降主义路线，不是偶然的。

施耐庵和罗贯中编写的《水浒传》尽管有一定历史事实作背景，也吸收了一些民间流传的故事情节，但它已经是一部经过作者重新创作的文学作品。作者竭力歌颂投降派，宣扬孔孟之道。作品体现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鲜明立场，地主阶级的反动世界观。其中的主题、主要人物和情节主线都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以“忠义”二字统贯全书，以宋江这个投降派为主角，写出了投降的全过程。所以过去有人干脆把它改名为《忠义水浒传》。

毛主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就是为了适应封建统治阶级扑灭农民革命的需要，它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产物。

元朝末年，阶级矛盾非常尖锐，“贫者从乱如归”，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最后终于发展成为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战争。1351年爆发了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红巾军喊出了“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的响亮口号，斗争矛头直指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红巾军转战北方，所向无敌，曾一度打到元朝统治中心大都（今北京）附近，吓得元朝皇帝都准备逃跑。在红巾军起义的影响下，长江、淮河、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农民都纷起响应。其中以湖北徐寿辉领导的另一支红巾军声势最大。刘福通和徐寿辉两支红巾军，很快将元王朝的统治区截为两段，使南粮不能北调，切断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命脉，严重威胁到元朝的反动统治。

在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元王朝摇摇欲坠。他们采用武装镇压和诱降招安的两手策略，向农民起义反扑，妄图挽救危局。

《水浒》的作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阶级大搏斗的时代。他们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才呕心沥血地炮制了这株大毒草。它以小说当奏折，向封建朝廷献计，要他们采用招安“良谋”，以瓦解农民革命队伍。它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把引起“天下变乱”的原因，归咎于奸臣，企图蒙蔽革命人民，不要把矛头指向皇帝。它对起义农民进行“忠义”说教，并用高官

厚禄、青史留名为诱饵，企图欺骗他们“改邪归正”，放弃革命斗争，争取招安，效忠皇帝。但是《水浒》没能扑灭农民革命的烈火，却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使我们能看清投降派的真面目。这个全过程就《水浒》全书来看，可以分为几个段落：

1——41回，写宋江在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如何走头无路，不得已上了梁山，混进了农民起义队伍。

42——60回，写宋江上梁山后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抢夺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

60——71回，写宋江上台后如何篡改农民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从政治思想和组织等各方面做好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准备。

71——82回，写宋江如何千方百计争取招安，投降朝廷。

83——120回，写宋江投降后如何充当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去镇压农民起义。最后写了宋江的下场。

《水浒》成书后，由于它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在明代广为流传。明末清初的反动文人金圣叹又采用腰斩《水浒》的办法，来宣扬自己的反动观点。

金圣叹腰斩《水浒》之前，流行的版本较多，主要的有两种：

一、百回本。这是最早的本子。在一百〇八将排座次之后，有宋江受招安、征辽、打方腊的故事。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容与堂本水浒传》就是百回本。

二、百二十回本。比百回本增加了打田虎、打王庆的故

事（91——110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汇校本《水浒全传》和中华书局1961年依据明末杨定见序本整理出版的《水浒全传》，都是百二十回本。

金圣叹腰斩《水浒》，是拿当时流行的百回本拦腰斩断，砍掉七十一回以后的“受招安”、“征方腊”等二十多回，并删去七十一回“排座次”以下的文字，加上卢俊义“惊恶梦”的情节，梦出一个嵇叔夜把一百〇八将一网打尽，作为全书的结束。这个本子，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欣赏和提倡，从此就压倒其它版本，广泛地流传开来。

金圣叹为什么要这样腰斩《水浒》？金圣叹对《水浒》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非常赞赏的，但对它宣扬招抚政策，则不同意。就是说金圣叹与施耐庵、罗贯中都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但在对付农民起义的策略上有分歧。施耐庵歌颂招安，宣扬投降，主张搞“挖心战”，从内部瓦解农民起义。金圣叹则强烈反对招安，疯狂鼓吹军事镇压。金圣叹生活的明清之际，特别是他批点《水浒》的时候，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严重地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明王朝对农民起义采取镇压与招抚相结合的反革命两手政策，而主抚派的招安阴谋屡遭失败。金圣叹从中吸取了教训，总结了反革命经验。他认为对宋江这一类“强盗”，只能斩尽杀绝，决不能招安，更不能让他们“立功”，否则就会导致鼓励“犯上作乱”的可怕后果。《水浒》宣扬招抚政策，他认为效果不好，必须加以消除。于是他把《水浒》拦腰斩断，并且通过评点、篡改，狂热鼓吹“斩尽杀绝”论。一部《水浒》经金圣叹这么一砍，便成了“断尾巴蜻蜓”。他把宋江背叛革命和投降后的种种丑恶表

演都砍掉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面目就不真实了。

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大量印行的七十一回本，是以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为底本，作了些必要的复原，删去“惊恶梦”，恢复“排座次”。这个本子同样看不到宋江投降的全过程。

为了充分利用《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都要重新出版。

二、《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毛主席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一指示，揭露了《水浒》全书政治思想倾向的反动性，抓住了它宣扬投降主义的要害。

《水浒》以“忠义”为宗旨，中心就是宣扬不反皇帝，忠于皇帝。过去有的人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把《水浒》当做“忠义”的代名词，这虽是为了赞美《水浒》，但确点破了它的真谛。事实上，《水浒》这部书就是以忠君为指导思想来设计情节，开展矛盾，塑造人物，确定褒贬的。

它吹捧宋徽宗赵佶“至圣至明”，“博施济众”，“求贤未尝少怠，爱民如恐不及”，把这个残酷镇压人民、剥削人民，生活上荒淫无耻的皇帝，打扮成全民的代表，真、善、美的化身。至于皇帝的“暂时昏昧”，只不过是“被奸臣闭塞”。因此，结论只能是“忠为君王恨贼臣”，皇帝不应该反，也不必要反；只要反一下贪官，就可以“云开见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就是《水浒》为农民起义确定的路线。

恩格斯指出：文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水浒》正是通过其精心塑造、全力歌颂的主要人物宋江，集中

地反映不反皇帝、忠于皇帝的思想。宋江这个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他推行投降主义的过程就是“尽忠报国”的过程。他到喝鸩酒临死时，仍说着“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话。死后阴魂不散，还向皇帝“垂泪启奏”，表示“臣死无憾”，忠心“始终无异”。《水浒》中塑造的主要“英雄”人物宋江，实际上是一个死心塌地效忠皇帝的奴才。

《水浒》在为宋江大唱赞歌的同时，却极力贬低、污蔑和攻击反皇帝、反朝廷的真正农民革命英雄。晁盖“托胆称王”，“要和大宋皇帝”作对，《水浒》就让他中箭身亡，“归天及早”，“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李逵主张“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反皇帝的态度最鲜明。《水浒》就让宋江破口大骂他“黑禽兽”，“割了你这厮舌头”，甚至要把他推出斩首。至于田虎、王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由于“自号为一国”，公开反皇帝，《水浒》对之深恶痛绝，攻击他们是“反贼”、“草寇”，最后把这三个“元凶贼首”碎剐于市。

《水浒》写农民起义而不反皇帝，这就清楚地暴露了它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实质。

在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备受地主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因而引起了农民的不断反抗，爆发了无数次的农民起义。而农民要反抗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必须反对封建国家，反对皇帝。因为封建国家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暴力工具，皇帝是封建国家的最高政治代表。正如列宁说的：“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

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也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

“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农民起义反不反皇帝，要不要推翻地主阶级专政，这是区别真革命与假革命，区别革命路线与投降路线的试金石。如果不反皇帝，不去触动封建政权，这种造反就是假造反，真投降。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而修正主义者恰恰在这一点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宋江打着造反的旗号，却跪倒在皇帝脚下，这同样是在当时条件下搞修正主义。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向反动统治阶级投降。宋江既然不反皇帝，那么，最后除了向皇帝投降，继续当皇帝的奴才，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

《水浒》以“忠义”为中心，一方面宣扬忠于皇帝，另一方面突出反贪官的斗争。宋江是反贪官的“英雄”，高俅则是贪官的代表。宋江与高俅的斗争贯串全书始终。

从表面看，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似乎是梁山农民起义军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似乎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其实不然。毛主席明确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为什么说宋江反对高俅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这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忠”与“奸”、“坏国”与“保国”的斗争。书中写高俅本是个“浮浪破落户子弟”，

“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因踢得一脚好球，得到皇帝宠爱，当上了殿帅府太尉。高俅发迹后，与蔡京、童贯、杨戩等朝廷中的旧权贵结合在一起，迫害“忠良”，为非作歹。例如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由于高俅的乾儿子高衙内要霸占他的妻子，最后逼得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雪夜上梁山”。甚至象宋江这样“仁义礼智信皆备”的人，把造反看成是“迷天大罪”的人，也被高俅一伙逼得上梁山暂时避难。《水浒》这种“奸”逼“忠”反的描写就是要说明：本来“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戩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而宋江之所以要反贪官，就是因为这些人误了封建之国，坏了地主阶级之家，害了“忠良”之民。反贪官的根本目的就是宋江自己反复说的要“尽忠报国”、“与国家出力”，也就是要通过反贪官，效忠皇帝，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维护地主阶级专政。宋江是穿着梁山领袖的外衣来反贪官的，实际上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演着以“忠”反“奸”的丑剧。无论“忠”者和“奸”者都是皇帝的奴才，只不过脸谱不同而已。

第二、他们之间的斗争反映了主剿派和主抚派对待农民起义的策略分歧。封建统治者总是用“剿”和“抚”的反革命两手来镇压农民起义的。但在一定条件下侧重采用哪一手，往往在统治者内部会发生争论，有人强调镇压，有人则强调招安。当时赵宋朝廷中对待梁山起义，有两派主张：一派是高俅等人，主张“剪草除根”、“扫清水泊”；另一派以宿元景为代表，主张招安，让他们为朝廷出力。《水浒》的倾向性很鲜明，它认为：“玺书招抚是良谋”，而反对招安的

人则是误国的奸臣。宋江为什么反高俅？原因之一，就是为他向朝廷投降扫除障碍。宋江在梁山与高俅、童贯大动干戈，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目的不是打击封建统治，而是为了争取投降。宋江是梁山农民军中的投降派，也是地主阶级主抚派在梁山的代理人。他和宿元景等在朝的主抚派，立场、观点是完全相同的。他与高俅在消灭农民起义、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立场上，也毫无区别，只是在策略上不同而已。宋江与高俅的斗争，实际上是地主阶级内部“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正因为宋江与高俅在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上是一致的，因此，他为了投降，可以对高俅“纳头便拜”，最后则公开和高俅共同去镇压方腊、田虎、王庆等农民起义军。

第三、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一切剥削者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的，其内部必然存在着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斗争。宋江功名利禄观念十分强烈，但他挤不进封建统治集团的行列，因而对高俅等把持朝政，专权当道，产生不满情绪。但是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宋江连遭失败，不但没有遂其“凌云志”，反而差一点被杀了头，这才被迫上梁山。宋江一派与高俅一派在经济上也进行激烈的争夺。殷天锡霸占柴皇城房宅园亭一事就是明显的例子。殷天锡是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的妻舅。高廉倚仗着高俅当了高唐州的知府，殷天锡又倚仗高廉“横行害人”。柴皇城是柴进的叔叔。柴家是后周柴世宗的后代，是个贵族世家。但因不掌握实权，殷天锡要霸占柴皇城的房屋园亭。结果，柴皇城被打死，家产被全部“抄扎”，柴进也被关进了死

牢。宋江攻打高唐州，反高廉这个贪官，就是这样引起的。由此可见，宋江一派在梁山反贪官，目的之一，是把农民革命队伍作为他们与高俅一派争权夺利的工具。“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就是宋江把梁山当做他升官发财的阶梯的自供状。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构成了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线。《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把宋江与高俅的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作为主要矛盾来写，其用心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用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来代替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用反贪官来偷换农民起义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从而把农民起义纳入地主阶级内部派别斗争的轨道，使农民起义不触犯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并屈从于他们利益的需要。这也就是要用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来改变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历史上，每当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爆发时，封建统治者从维护其根本利益出发，往往要喊出“反贪官”的口号，甚至要惩办几个贪官污吏，表示他们要“澄清吏治”，借以欺骗农民，转移他们的革命锋芒。《水浒》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玩弄的就是这种鬼花招。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古代，农民闹革命，就要敢把皇帝拉下马，推翻地主阶级专政。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必然受招安。在现代，无产阶级要翻身求解放，就必须通过武装斗争道路，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敢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只满足于议会中争得一席